

## 《文心雕龍》論曹丕

方元珍\*

### 摘 要

曹丕是一代守成的明君，也是建安文學的俊傑，無論詩賦文章、文學理論，及對當時文風的鼎盛，都有開創性的建樹，與深遠的影響。劉勰對於曹丕的評論，基本上不離這些範疇，不僅探討的文學體裁甚廣，且寄語褒貶，言而有據，大致可信；對於曹丕的文學觀點，如文氣說、文士批評的態度、文章的地位與作用等，亦多予以甄採、肯定，並據以開創其文體、文術、鑒賞批評的理論；對於曹丕文學上的評價，也能不受政治因素、輿情的左右，全面性地客觀探討；尤其以宏觀的器識，掌握曹丕好文，直接促成建安文士受重視、小賦流行、詔令獨盛的文風，皆為有識之見。惟劉勰基於樂教思想的侷限，與重視文學的教化功能，視〈燕歌行〉同韶夏之鄭曲，忽略〈燕歌行〉在詩歌形式上開創性的貢獻；又責謎語用乖遠大，則不免矯枉過正。此外，以建安文學部分的特質，代替全體，既無法涵蓋建安文學的全面，「觀其時文，雅好慷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的說法，亦無法突顯曹丕詩文主要的內涵與特質。

**關鍵詞：**文心雕龍、劉勰、曹丕、建安文學

---

\* 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專任副教授，中國文化大學文學博士。

自幼隨父轉戰軍中，知騎善射的曹丕，兼通文事，不但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sup>1</sup>，結集諸儒編撰《皇覽》，宏揚學術；且著作繁富，流傳迄今有詩歌四十餘首、辭賦約三十篇，銘、誄、連珠等韻文七篇、散文一五〇篇，《魏書·文帝紀》評云：「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兼該」，洵非虛譽。劉勰《文心雕龍》對於這一位君王作家，也頗青睞，文體、文術、文評各論，均對曹丕的文學創作、論文觀點，及文學史上的評價，予以甄採詮評，不僅發皇曹丕對當代及後世文學創作與理論建構的貢獻，也具足展現曹丕對《文心雕龍》成書的影響。以下便試論《文心雕龍》對曹丕的評述：

## 壹、論曹丕推動建安文學

誠如《文心雕龍·時序》篇所云：

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建安文學的蔚然興起，與政治興衰、時君的愛好倡導，及社會動亂均有關係。以政治的興替、時君的好尚而言，自建安十三年以後，三國鼎立之勢形成，政局大抵安定，曹操擔任丞相，辟召文士，倡導文學，固然是鄴下文風形成的必要條件；而文帝纂業，篤好創作，日與眾文士詩文唱和，講論文學，尤為當時文風蓬勃發展的重要原因。按曹丕於建安十六年為五官中郎將，乃丞相之副，徐幹等為五官將文學，至建安二十二年，建安諸子如阮瑀、王粲、陳琳、應瑒、劉楨、徐幹先後凋零為止，這段期間乃曹丕與鄴下文人活動最頻繁、興盛之時。如曹丕〈與吳質書〉云：

<sup>1</sup> 見於《魏書·文帝紀》引《典論·自敘》。

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棋閑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鷺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暝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寶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淒然傷懷。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

文中敘寫曹丕與建安諸子交遊的情形，所謂「高談娛心」、「同乘並載」，足見他們交往的密切，與友誼的深厚。謝靈運〈擬鄴中集詩〉亦云：

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讌，究歡愉之極，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並，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彥共盡之矣。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何者？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漢武帝徐樂諸才，備應對之能，而雄猜多忌，豈獲晤言之適？

由謝靈運自述其親身經歷，可以想見建安末年君主重視文學，與文士並無猜忌的情形，應即曹丕與文士和樂相處之實況，謝氏以為「古來此娛，書籍未見」。而自曹丕〈敘詩〉云：「為太子時，北園及東閣講堂並賦詩，命王粲、劉楨、阮瑀、應瑒等同作」<sup>2</sup>、〈寡婦賦·序〉云：「陳留阮元瑜與余有舊，薄命早亡，每感其遺孤，故作斯賦，以敘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並作之」、曹植〈公宴〉詩云：「公子愛敬客，終宴不知疲」、陳琳〈瑪瑙賦·序〉云：「五官將得瑪瑙，以為寶

<sup>2</sup> 按曹丕立為太子，時在建安二十二年十月，而阮瑀逝於建安十七年，王粲逝於建安二十二年正月，〈敘詩〉所言「為太子時」，疑或有誤，惟仍可見曹丕與建安諸子以詩會友的情景。

勒，美其英采之光艷也，使琳賦之」、劉楨〈贈五官中郎將〉之一云：「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眾賓會廣坐，明鏡俾炎光」，皆可看出建安諸子的作品有許多乃承曹丕旨意而作，曹丕實乃曹氏兄弟與眾文士遊宴的中心人物，此即劉勰所謂「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對建安文士的英才輩出極有推進的貢獻。曹丕與文士賓客交遊的內容，除了如劉勰所言：「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以宴遊田獵、唱酬詩賦為主，還涉及文學觀點的敘述、建安文友文章風格的評論，如曹丕〈又與吳質書〉云：「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皆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曹植《娛賓賦》云：「文人騁其妙說兮，飛輕翰而成章。談在昔之清風，總聖賢之紀綱。」是知曹丕以「副君之重」，在建安文學活動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不僅重視文士，與其相交相知，促成建安文學作品繁富、品評文章好壞的風氣，甚至將建安七子的遺文，結集成書<sup>3</sup>，其對建安文學興盛、作品流通的貢獻，實遠過於曹操、曹植。

至於《文心雕龍·時序》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則呈顯社會治亂對於建安文學的影響。文中所謂「梗概」，意即「慷慨」，雖《說文》不見「慷」字，而「慨」釋為「忼慨」，又釋「忼」為「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據《史記·項羽本紀》稱楚王項羽賦〈垓下歌〉時，「悲歌慷慨」，〈高祖本紀〉賦〈大風歌〉時，「慷慨傷懷」；《後漢書·彌衡傳》則云：「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可見「慷慨」一詞，有「悲而壯」的涵義<sup>4</sup>。顯示劉勰對於時會牽動一代文學特色的觀察，深識鑿奧，妙得於心，頗能掌握建安作家由於遭時喪亂，多憂生之嗟，所作多悲涼之氣；而於亂世中，思圖濟世立名，尤使作品流露意志深遠，雄壯昂揚之氣的時代文學特質。以曹丕而言，也確有部分作品呈現此一時代性的文學特質。〈典論·自敘〉云：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鳩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

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

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

3 見於曹丕〈又與吳質書〉云：「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

4 見於李直方著《漢魏六朝詩論稿·「慷慨以任氣」說》一文，頁三二。

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於滎陽，河內之甲軍於孟津。

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

陌，以還相吞滅。會黃巾盛於海岱，山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席

卷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廓睹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

此為曹丕反映漢末豪強割據，社會亂離，人命如草芥的現實生活之作。曹丕〈上留田行〉云：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與粱。上留田！貧子食糟與糠，上  
留田！貧賤亦何傷？上留田！祿命懸在蒼天，上留田！今爾歎息，將  
欲誰怨？上留田！

此乃借古題，寫時事的樂府詩，亦頗能反映當時社會貧富懸殊，貧賤之子內心的悲歎。而〈令詩〉云：「喪亂悠悠過紀，白骨縱橫千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佐時整理」，〈黎陽作〉云：「爰暨公旦，載主而征，救民塗炭。彼此一時，惟天所贊。我獨何人，能不靖亂」，〈至廣陵於馬上作〉云：「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將懷暴怒，膽氣正縱橫。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豔歌何嘗行〉云：「男兒居世，各當努力」，均為曹丕流露掃平世亂，努力奮發思想的詩作。是以劉楨〈贈五官中郎將〉之四曾謂：「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時序》篇亦云：「漢末大亂，民怨沸騰，魏武雄興，志存勘定；文帝纂業，雅好詞華，影響所及，文風亦慷慨而多氣」，殆指曹丕此類作品而言。當展讀這些「志深筆長」、「悲壯慷慨」的作品之際，自能感受一股勁氣貫通其中。只是這類流露慷慨昂揚壯志的作品，畢竟是曹丕著作中的極少數，曹氏今存四十五首詩歌中，不過占四首，沈德潛《古詩源》卷五云：「子桓詩有文士氣，一變乃父悲壯之習矣，要其便娟婉約，能移人情」，便指出曹丕詩歌之長不在悲壯。故劉勰「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的說法，對曹丕而言，並不全然適用。此因劉勰以概括論述的方式綜論建安的文學風尚，自無法涵蓋個別作家的差異；更何況劉勰論

文，鑑於宋初以後的作品「風末氣衰」<sup>5</sup>，故有「以氣質卓犖之文，一救當世靡麗闡緩之弊」<sup>6</sup>的用心，他所以特別強調建安志深筆長，梗概多氣的作品，實別有深衷。

劉勰在探索建安文風的成因時，獨對學術潮流的影響有所遺漏，可說是百密一疏。《論說》篇云：「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僅有論及魏武倡導刑名之學，對論體興起的影響；實則「魏文慕通達，天下賤守節」<sup>7</sup>，對當代的文學發展也有深遠的作用。按曹丕曾作〈太宗論〉，崇尚漢文帝的無為思想，黃初年間，並先後頒佈薄稅、禁復仇、輕刑之詔，欲以黃老清靜之治，予民休養生息，是道家之治的實行家。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便曾論述道家思想盛行，對魏晉文風、曹丕創作的影響：

在儒學衰微的魏晉，接著起來的，是道家與佛學的思想。乘著這個自由解放的好機會，文學也就向儒學宣告獨立。由漢代的諷刺的功利主義，變為魏晉的個人主義，再變而為南朝時代的唯美主義了。在這種文藝思潮變動的過程中，魏晉時代確是一座重要的橋樑。對於這個文學獨立運動首先發動的人，……是曹丕。……《典論·論文》內，……他首先敘述了對於建安七子的作品的品評。……完全脫了儒家的倫理實用觀念，只以氣與個性為標準。其次他對於文學的對象，有離開六藝學術而注重純文藝的傾向。

可見受到道家思想影響，使得曹丕的創作，與建安文學日趨重視文學本身的價值，及個人的抒情詠懷。惟此一學術思潮牽動文學的內在移轉的力量，並未被劉勰所重視。

<sup>5</sup> 見於《文心雕龍·通變》篇。

<sup>6</sup> 《文心雕龍校釋·時序》云：「舍人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四語，識解甚高，誠溯河窮源之論矣。參以風骨之言，知舍人之志，蓋欲以氣質卓犖之文，一救當世靡麗闡緩之弊。」

<sup>7</sup> 見於《晉書·傅玄傳》。

## 貳、論文學創作

### 一、五言為主，樂府清越

劉勰於〈明詩〉篇以通史的眼光，歷數各代詩體的發展情形，自然也涵蓋建安時期五言詩流行的脈動：

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躍，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劉勰所謂「建安之初，五言騰躍」，驗之於《詩品·序》云：「降及建安，……蓋以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證實建安詩歌雖然形式方面各體兼具，而以五言詩的表現最為傑出。查考曹丕今存四十五首詩中，五言詩占二十五首，已然過半，亦與劉勰之說相合。據唐人元稹〈杜甫墓誌銘〉云：

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適文壯節，抑揚哀怨別離之作，尤極於古。

形容曹操與曹氏兄弟縱橫沙場，兵馬倥傯之際，不忘興文，故作品頗有剛健昂揚之氣，此說頗能詮釋〈明詩〉：「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的說法，而劉勰特別指出的是與王粲、徐幹、應瑒、劉楨等人，同樣的「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的作品，據范文瀾注「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即「如《文選》所載公讌詩、遊覽詩、贈答詩是」。畢竟隨軍出征的時期，除了征戰以外，曹丕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鄴城，日與文士鬥雞、彈棋、遊獵、飲酒、賦詩，曹丕的摯友吳質有〈答魏太子箋〉云：「昔侍左右，廁作眾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樂。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足以反映當時的真實生活。曹丕此類宴遊詩，如寫景紀遊的〈芙蓉池作〉：

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卑枝拂羽蓋，  
修條摩蒼天。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  
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鮮。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遨遊快心意，  
保己終百年。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五評曰：「建安正格。後人非不追做，然正不易似。試細玩味之，『雙渠』四句，寫景何其生動。『飛鳥』句，健。『丹霞』二句，光澤鮮麗。結四句，俛仰有情。」又如描述飲宴的〈于譙作〉：

清夜延貴客，明燭發高光。豐膳漫星陳，旨酒盈玉觴。弦歌奏新曲，  
游響拂丹梁。餘音赴迅節，慷慨時激昂。獻酬紛交錯，雅舞何鏘鏘！  
羅纓從風飛，長劍自低昂。穆穆眾君子，和合同樂康。

陳祚明論曰：「此所謂建安體，華腴之中，妙能矯健」，意指這兩首代表「建安正格」的詩都具有建安詩風勁健有力，而且用語鮮麗的特色，這顯然與劉勰所謂「不求纖密之巧」、「唯取昭晰之能」的說法，不盡相合；更何況曹丕這兩首詩，雖寫得勁健，卻不具有劉勰所謂「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的悲壯的志氣，曠朗的襟懷，詩云「保己終百年」、「和合同樂康」，所流露的永保長壽、君臣歡娛的思想，即劉履《選詩補註》卷二所謂「縱一己流連之情」，毋寧是曹丕更關切的主題。兩首被譽為「建安正格」的遊宴詩尚且如此，至於其他描寫遊樂、宴飲的作品，如「忘憂其容與，暢此千秋情」（〈于玄武陂作〉）、「從朝至日夕，安知夏節長」（〈夏日〉）、「沖靜得自然，榮華何足為」（〈善哉行〉之一），更是無關悲壯勁健之宏旨！尤其這類五言詩，為求形容生動、聲色俱美，常有變散行為偶句，改略貌為形似，用辭華美的傾向。卞蘭〈贊述太子賦〉曾云：「作敘歡之麗詩」，足為佐證，並可看出曹丕遊宴詩實已部份實踐了他「詩賦欲麗」的觀點。

其實，真正能代表曹丕五言詩的，並不是這類酬對的宴遊詩，而是掩抑低迴

的抒情詩<sup>8</sup>。它們在內容上多寫征夫行役、夫婦別離相思之苦，語言明白易曉，如〈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作〉云：

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冽冽寒蟬吟，

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輕忽遷移。不悲身遷移，但惜歲月馳。

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為雙黃鵠，比翼戲清池。

首句「與君結新婚」言「合」，第二句「宿昔當別離」寫「離」，反襯出新婚夫婦分離之苦；第三、第四句：「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描述自然恒「常」，借比夫妻相隨，第五、第六句：「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映襯景物有「變」，暗喻新婚之妻頓失倚恃；結語六句：「不悲身遷移，但惜歲月馳。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為雙黃鵠，比翼戲清池」則描摹出新婚之妻無怨的深情與期待。全詩明白如話，善用比喻，最足以表現思婦懷人的深情婉轉，並以疊句首尾相連，形成情感的連綿迴環，有一唱三歎之效。鍾惺《古詩歸》卷七云：「文帝詩便婉變細秀，有公子氣，有文士氣，不及老瞞遠矣。然其風雅蘊藉，又非六朝人主所及」，其說信然！再如〈雜詩〉之二云：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

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得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本詩藉浮雲以喻飄泊不定之遊子，末寫久客異鄉的畏人心情，以物擬人，借景寓情，可謂入木三分。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五譽為：「獨以自然為宗，言外有無窮悲感，若不止故鄉之思。寄意不言，深遠獨絕，詩之上格也。」鍾嶸《詩品》評曹丕五言詩，亦云：「率皆鄙質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

<sup>8</sup> 曹丕詩內容主要分為四類：一寫酬對宴遊，如〈孟津〉、〈芙蓉池作〉、〈于玄武陂作〉等，描寫宴飲、田獵、遊樂等生活，皆為五言，共十首；二寫行軍征戍，如〈黎陽作〉、〈至廣陵馬上作〉、〈飲馬長城窟行〉、〈董逃行〉，寫軍容壯觀，行軍艱難，含四言二首、五言四首、六言一首，共七首；三寫遊子思婦孤兒，如〈於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代劉勳出妻王氏作〉、〈雜詩〉、〈艷歌何嘗行〉、〈短歌行〉、〈燕歌行〉等，皆以抒情婉轉取勝，計四言五首、五言八首、六言一首、七言二首、雜言一首，共十七首；四寫詠史政經遊仙傷時等，包括四言四首、五言三首、六言一首、雜言三首，共十一首。數量以第三類為最多，也最具代表。

瞻可翫，始見其工矣。」謂曹丕詩歌如「偶語」，似同兩人對話般地自然平易；即使是鍾嶸認為「美瞻可翫」的「西北有浮雲」詩，其實亦質樸易曉，故知劉勰以魏文「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的作品，認為是「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者，若用指曹丕被譽為「詩之上格」，推為代表的抒情詩將更恰當。

劉勰於〈明詩〉篇先合論曹氏兄弟五言詩的表現後，又分論四言、五言的代表作家，各有專美：

四言正體，雅潤為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華實異用，惟才所安。

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

仲宣，偏美則太沖、公幹。

劉勰以曹植、王粲為四、五言詩代表，以劉楨偏美五言，而不列曹丕的觀點，與南朝詩評家大同小異，如鍾嶸《詩品》便以曹植、劉楨、王粲，並列五言詩的上品，曹丕列於中品。顏延年《庭誥》云：「至於五言流靡，則劉楨張華，四言側密，張衡王粲，若夫陳思王，可謂兼之矣。」則以劉楨、王粲為四、五言詩的俊傑，曹植兼具眾美，亦未列曹丕。顯然丕詩不足以為建安四、五言詩的翹楚，已成為當時的定評。此因曹丕之四、五言詩，擅寫纏綿柔情，既非以雅正溫潤見長；又「率皆鄙質如偶語」，故不符合《文心雕龍》「四言雅潤，五言清麗」的標準，更無法受到南朝好尚詞藻的詩評家的青睞。

曹丕在四、五言詩的成就，固不如上舉數家，然其在七言詩體的貢獻，卻已名垂詩史，惟劉勰標舉宗經思想，認為《詩經》以四言詩為主，故僅於〈明詩〉篇提出四言為「正體」、而以當時流行的五言為「流調」的說法，並說明雜言詩的由來，而未提及曹丕七言詩對詩體形成、發展的意義；〈樂府〉篇甚至對〈燕歌行〉有負面的評價：

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眾引、

「秋風」列篇，或敘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慆蕩，辭不離於哀思，

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

按曹丕〈燕歌行〉兩首，為樂府古題，屬相和歌平調曲，其一云：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鵠南翔，念君客游多思  
腸。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為淹留寄他方？賤妾瑩瑩守空房，憂來思君  
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  
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何梁。

內容在描寫征戍之人不歸，思婦的感傷怨曠之情，劉勰所謂「或傷羈戍」，「辭不離於哀思」，即指此而言；其形式採整齊的七言，共十五句，音節可自句尾押韻、與音節組合得之。據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五云：「蓋句句用韻者，其情掩抑低迴，中腸摧切，故不及為激昂奔放之調，……故此體之語，須柔脆徘徊，聲欲止而情自流，緒相尋而言若絕。後人倣此體多不能佳，往往以粗直語雜於其間，失靡靡之態也。」即指〈燕歌行〉每句押平聲韻，一韻到底，有樂音柔靡低迴的情致；而每句的音節大抵採用二二一二的句法，以每句四頓的方式組成，雖說節奏很整齊，卻缺少錯綜的變化，故劉勰謂之「宰割辭調，音靡節平」！劉勰並以韶樂、大夏古樂的標準來衡量，認為〈燕歌行〉等樂府雖然出自於相和歌辭清、平、瑟調的正聲，卻因詩辭不出於哀思，音調非中和之響，而視同淫辭蕩曲的「鄭聲」。蓋劉勰基於先秦兩漢以來逐漸形成重視「樂」與「和」、「德」關係的觀點，頗為強調音樂的中正平和，與具有社會倫理道德的作用，以「中和」、「奉禮」做為樂府歌詩的好壞標準<sup>9</sup>，故連歷來被詩評家譽為「非鄴下諸子可及」<sup>10</sup>，「開千妙境」<sup>11</sup>的〈燕歌行〉都被他視為淫靡之音，劉勰深受樂教的侷限也就可見一斑了。至於〈燕歌行〉擺脫柏梁臺聯句詩、張衡〈四愁詩〉因襲楚辭的句法，成為形式完整的第一首七言詩，具有詩歌史上開創性的貢獻，誠如蕭滌非《漢魏六朝文學史》所言：

丕對於文學之最大貢獻，乃不在批評方面，而在其能繼〈郊祀歌〉之

<sup>9</sup> 見於本人著〈劉勰與民間文學〉，收錄於《文心雕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上)，三四四頁。

<sup>10</sup> 見於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三。

<sup>11</sup> 見於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三。

後，而完成之七言體詩。其七言〈燕歌行〉兩篇，不僅為樂府產生一新體制，實亦為吾國詩學界開一新紀元。

而劉勰對此隻字不提，實為其所未見也。

揆諸《文心雕龍·樂府》詩對曹丕樂府詩歌的評驚，還不及〈才略篇〉云：「子桓……樂府清越」來得切當！周履靖《騷壇秘語》卷中云：「魏文帝自然浮俊」，王夫之《薑齋詩話》云：「子桓精思逸韻」，都可做為劉勰此語的註解，指曹丕的樂府詩言語清新，意境悠遠。今其樂府存者有二十首，四、五、六、七言及雜體詩，各體均備，文辭上受樂府民歌的影響，有敘事化、通俗化的傾向，內容風格則源自《古詩十九首》的遺風，表現文人對生命現象、人生無常的感懷，富於含蓄婉轉的情致。如〈艷歌何嘗行〉云：

何嘗快獨無憂，但當飲醇酒，炙肥牛。長兄為二千石，中兄被貂裘。

小弟雖無官爵，鞍馬馭馭，往來王侯長者遊。但當在王侯殿上，袂獨

檮蒲六博，對坐彈棋。男兒居世，各當努力。蹙迫日暮，殊不久留。

少小相觸抵，寒苦常相隨。忿恚安足諍？吾中道與卿共別離。約身奉

事君，禮節不可虧。上慚倉浪之天，下顧黃口小兒。奈何復老心皇皇，

獨悲誰能知。

曹丕借舊題，寫時事，道出富家子弟途窮日暮，其妻悲怨之情。其中如「飲醇酒，炙肥牛」為《相和歌·西門行》的成句，「長兄為二千石」數句，脫化自《相和歌·長安有狹斜行》，「上慚倉浪之天」兩句，則只稍變《相和歌·東門行》的詞語，故王夫之《船山古詩評選》卷一評曰：「序事不入傳記，俳諧不入滑稽口號，古人幸有此天然樂府詞」可見由於漢樂府民歌的浸潤，使曹丕樂府詩有代人敘事、言語清新的特點。又如〈丹霞蔽日行〉云：

---

丹霞蔽日，采虹垂天。谷水潺潺，木落翩翩。孤禽失群，悲鳴雲間。

月盈則沖，華不再繁。古來有之，嗟我何言。

黃節《魏文帝詩注》以為「此詩取古辭『讒邪害公正』、『浮雲蔽白日』而作，意亦效之」。作者由自然現象，引發人生無常的感慨，於漫漫的時間長河中，有所醒豁，讀來餘韻無窮。陳祚明曾以「淡逸處彌佳」<sup>12</sup>，來形容曹丕樂府的清淡悠遠，寄意深長，與劉勰論曹丕「樂府清越」有異曲同工之妙。

## 二、妙善辭賦

魏晉文風沿襲漢賦的盛況，辭賦仍然是詩歌之外的另一主要文學形式，曹丕對辭賦亦很重視。有〈答卞蘭教〉云：「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並為卞蘭寫賦贊述太子美德，賜牛一頭；又於《典論·論文》中提出「詩賦欲麗」的觀點，評論建安諸子，謂「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也以辭賦為主。不但如此，《文心雕龍·時序》篇說「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可見曹丕的辭賦亦頗可觀；而由曹丕賦作近三十篇，絕大部分為鄴城時期所作，也與〈時序〉的說法相吻合（曹丕稱帝後，即定都洛陽）。今觀其辭賦眾作，或敘事抒情，如〈浮淮賦〉，描述威武軍勢，抒發同仇敵愾之情，〈感物賦〉由諸蔗已衰，悟出世事興廢的無常，〈寡婦賦〉敘阮瑀之逝，其妻悲苦之情，〈校獵賦〉寫隨父出獵，豐收慶功的歡娛等；或寫景詠物，如〈登臺賦〉描繪銅雀臺的壯觀，及登臺所見的美景，〈柳賦〉歌頌柳樹的美姿與貞德等。茲舉〈滄海賦〉為例：

美百川之獨宗，壯滄海之威神。經扶桑而遐逝，跨天涯而托身。驚濤

暴駭，騰聊澎湃。鏗訇隱潏，涌沸凌邁。於是鼉鼉漸離，泛濫淫游。

鴻鸞孔鵠，哀鳴相求。揚鱗濯翼，載沈載浮。仰唼芳芝，俯漱清流。

巨魚橫奔，厥勢吞舟。爾乃釣大貝，采明珠，擣懸黎，收武夫。窺大

麓之潛林，暗搖木之羅生。上蹇產以交錯，下來風之泠泠。振綠葉以

<sup>12</sup> 見於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五。

葳蕤，吐芬葩而揚榮。

顯然曹丕的賦篇幅短小，描寫精鍊集中，少有鋪張揚厲，堆砌誇飾之語，且形容生動真切，為其特色；尤其曹丕辭賦內容大抵仍以抒情賦為主，俳側有風致，為其擅長；有些作品並能反映社會現實，表現「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時代背景，可說是漢賦的轉變，建安辭賦的典型。劉勰說文帝「妙善辭賦」，正是恰如其分的批評。只是與建安其他賦家相比較，「仲宣靡密，發篇必適」、「偉長博通，時逢壯采」<sup>13</sup>，王粲、徐幹之賦，實較曹丕更能突顯建安適壯健勁的時代特徵。觀摯虞《文章流別論》對曹丕、陳琳、王粲、應瑒、劉楨等人同題賦作的比較：

建安中，魏文帝從武帝出獵，賦，命陳琳、王粲、應瑒、劉楨並作。

琳為〈武獵〉、粲為〈羽獵〉、瑒為〈西狩〉、楨為〈大閱〉。凡此各有

所長，粲其最也。

眾家之賦，以王粲為魁；曹丕《典論·論文》亦言：「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即已透顯王粲、徐幹被劉勰譽為「魏晉賦首」之消息<sup>14</sup>。而值得深思的是，「魏晉賦首」的背後，卻與曹丕以世子之尊，積極推動建安時期抒情小賦的繁盛有關，如王粲的〈寡婦賦〉、〈槐樹賦〉、〈柳賦〉、〈鶯賦〉、〈羽獵賦〉、〈迷迭賦〉、〈瑪瑙勒賦〉、〈車渠劔賦〉，陳琳的〈武獵賦〉、〈瑪瑙勒賦〉、

〈車渠劔賦〉，應瑒的〈西狩賦〉、〈迷迭賦〉、劉楨的〈大閱賦〉，徐幹的〈車渠

劔賦〉，丁廙的〈寡婦賦〉，皆承曹丕之命，唱和酬答而作，顯見曹丕對魏賦的創作之多，作家之眾，實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劉勰於〈時序〉篇云：「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雖僅數筆勾勒，卻已精要道出建安小賦蓬勃發展的成因，洵為有識之見。

### 三、詔令辭義多偉

「詔策」為古代帝王對臣民的告語，又有「命」、「令」、「制」等異名。魏晉

<sup>13</sup> 見於《文心雕龍·詮賦》。

<sup>14</sup> 見於本人著〈文心雕龍論王粲〉，收錄於《空大人文學報》第九期，四九頁。

詔令，盛極一時，也與曹丕關係密切。《文心雕龍·詔策》篇云：

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逸群；衛覬〈禪誥〉，符采炳耀，弗可加已。自魏晉誥策，職在中書，劉放張華，並管斯任，施令發號，洋洋盈耳。魏文帝下詔，辭義多偉，至於作威作福，其萬慮之一弊乎！

謂建安末年，重視詔策的風氣興起，曹操九錫冊命，由潘勗所作，典贍雅飭；冊詔曹丕的禪誥，則出自衛覬之手，文采斑斕，顯見六朝以下，詔策亦有文尚華麗的趨勢；尤其自魏文帝改秘書令爲中書，置監令，三祖的命詔，多中書監劉放所爲，更是文辭美盛可觀。本文中，劉勰除了陳述曹丕與詔策文體興盛變遷的關係，並對曹丕的詔令文字，有所臧否。查考曹丕自稱帝後，所頒的詔令近百篇，大抵而言，足以表徵其爲舊式明君的典型<sup>15</sup>。尤足稱道者，如黃初三年，杜絕后室宦官弄權的〈禁婦人與政詔〉：

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違背，天下共誅之。

同年又頒〈取士勿限年詔〉，選拔賢德之士：

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

---

<sup>15</sup> 見於郭沫若《歷史人物·論曹植》。

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

並對長年苦於征戰世亂的庶民，予以休養生息，於黃初四年先頒〈禁復私仇詔〉：

喪亂以來，兵革縱橫，天下之人，多相殘害者。……今兵戎始息，宇內初定，民之存者，非流亡之孤，則鋒刃之餘。當相親愛，養老長幼。自今以后，宿有仇怨者，皆不得相仇，敢有復私仇者，皆族之。

黃初五年，繼頒〈議輕刑詔〉，避免苛政擾民：

近之不綏，何遠之懷？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太山之哭者，以為苛政甚於猛虎，吾備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豈可以目玩其辭，行違其戒者哉？廣議輕刑，以惠百姓。

曹丕〈禁婦人與政詔〉，禁絕了東漢末年以來外戚宦官的專權為禍；〈取士勿限年詔〉，改變了曹操「唯才是舉」的做法，以才德兼備為取士的標準；〈禁復私仇詔〉、〈議輕刑詔〉，則禁武暴，行仁政，使流離百姓獲安，皆為魏文帝切中時弊的重要為政措施。張溥《魏文帝集·題辭》云：「魏王帝業無足稱，惟令宦人為官，不得過諸署令；詔群臣家不得奏事太后，后族家不得常輔政任，石室金策，可寶萬世」，便讚美曹丕的詔令，足以開創新頁，流聲史傳；而劉勰稱許曹丕的詔文「辭義多偉」，不亦宜乎！只是美中不足者，曹丕有〈詔征南將軍夏侯尚〉一篇云：

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

文中曹丕自認可以隨意施威降福，操生殺權柄；蓋魏文因與夏侯尚友善，曾為布

衣之交，故乃出此不遜之言。此詔後爲夏侯尚交給蔣濟看，蔣濟對文帝說「但見亡國之語耳」，曹丕於是追回詔令<sup>16</sup>；劉勰所謂「至於『作威作福』，其萬慮之一弊乎！」，即指曹丕本詔措辭不當。其實，所以如此者，實與曹丕之行事風格有關。觀王粲好驢鳴，後卒，文帝臨其喪，遂命同遊各作一聲驢鳴以送之<sup>17</sup>；及借取劉楨廓落帶時，魏文因書嘲劉楨說：「夫人因物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sup>18</sup>，皆與「作威作福」之戲語如出一轍，乃曹丕慕老莊，個性放達之一面有以致之。

#### 四、其他文體作品

《文心雕龍·銘箴》篇曾評論曹丕的銘文云：「魏文九寶，器利辭鈍」，所謂「九寶」，指曹丕命良工所鑄之兵器，有劍三、刀三、匕首二、露陌刀一，見於《典論·劍銘》。銘辭曰：

惟建安廿有四載二月甲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劍三。其一長四尺二寸，重一斤十有五兩，淬以清漳，厲以礪吧，飾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名曰飛景。其二名流采，色似彩虹，長四尺二寸，重一斤十有四兩。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刀三。其一長四尺三寸六分，重三斤六兩，文似靈龜，名曰靈寶。其二采似丹霞，名曰含章。長四尺三寸三分，重三斤十兩。其三鋒似霜，刀身劍缺，名曰素質。長四尺三寸，重二斤九兩。魏太子造百辟匕首二。其一理似堅冰，名曰清剛。其二曜似朝日，名曰揚文。又造百辟露陌刀一，長三尺二寸，狀如龍文，名曰龍鱗。

<sup>16</sup> 見於《三國志·魏書·蔣濟傳》。

<sup>17</sup> 見於《世說新語·傷逝第十七》。

<sup>18</sup> 見於《三國志·魏書·王粲傳》引《典略》。

曹丕縷述九寶之形製、重量、名稱等，辭義平實呆滯，雖能符合銘體「取事也必覈以辨」的寫作要領，卻有違「摛文也必簡而深」之體則；茲以本文與曹植〈寶刀銘〉相比較：

造茲寶刀，既礪既礪。匪以尚武，予身是衛。麟角是觸，鸞距匪蹶。

無論就寶刀作用、形製特徵的描寫，曹植之作都要深刻、鮮活許多，也更能體現銘辭「義典則弘，文約為美」的特色。劉勰以「器利辭鈍」，反諷曹丕的〈劍銘〉，真是形容貼切。

自漢末建安以來，有關諧笑的作品頗多，《文心雕龍·諧謔》篇云：「懿文之士，未免枉轡。潘岳〈醜婦〉之屬，束皙〈賣餅〉之類，尤而效之，蓋以百數。」即說明當時諧辭風行的盛況；同篇並指「至魏文因俳說以著《笑書》，薛綜憑宴會而發嘲調，雖抃笑衽席，而無益時用矣」，據范文瀾註云：

《魏志·文帝紀》未言其著《笑書》，裴松之注最為富博，亦未言及，

《隋志》不著錄，諸類書亦無引之者，未知何故。魏文同時有邯鄲淳，

撰《笑林》三卷。（《隋唐志》同）馬國翰輯得一卷。……魏文《笑書》，

當此類也。

范注雖疑魏文著《笑書》之事，史籍無任何記載，卻仍將其歸為與邯鄲淳《笑林》一類，為小說家書。然王利器《文心雕龍新書·諧謔》篇云：

『文』原作『大』，黃注本改。……疑『大』為『人』字之誤，指魏

人邯鄲淳之《笑林》也。

王氏認為「魏文因俳說以著笑書」，應為「魏人」（邯鄲淳）之誤，其說可信。今查《隋書·經籍志》，曹丕著《笑書》固已不可考，而《隋志》云：「《列異傳》三卷，魏文帝撰」，以《列異傳》之志怪小說，為曹丕所作。《後漢書注》、《初學記》所引《列異傳》文，也都標明魏文帝撰。由於作者存疑，或以為託名曹丕所

作，故〈諧讖〉篇亦未提及。

〈諧讖〉篇並述及魏代以來，君子喜好隱語，而產生「謎語」的新文體，又說：「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博學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大」，指曹丕、曹植、曹髦都作謎語，或精練周密，或泛舉眾物；只是謎語做為戲謔滑稽的遊戲之作，畢竟不合劉勰「頗益諷誡」之旨要。按曹丕等人之謎語，今雖皆無可考，然可藉以得知劉勰對謎語起源、作品、作法的關切，並將之納入正式文體，足徵其對民間文學並未忽視<sup>19</sup>。

## 參、論文學觀點

曹丕的文學觀點，主要見於《典論·論文》、〈又與吳質書〉、〈與王朗書〉等；其中論題最廣，成就最著者，莫過於《典論·論文》，表述的文學觀點，涵蓋作家個性與文學作品的關係、文體的分類與風格、文學批評的陋習與正確的態度、文章的價值等，是我國最早的一篇論文的專著。《四庫全書總目》曾云：「建安黃初，體裁初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意味著當時文學創作的鬱然興盛，促成《典論·論文》的問世，也帶動了文學批評的新風氣，而討論的課題，如作者才性、文體風格，成為六朝文論的主要議題；探討文學自身的價值，也觸發了文學自覺的精神，不僅是我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並對後來文論的推進影響深遠。對於曹丕在文論方面的見解，劉勰亦相當重視，不但文術、文評各篇，多次援引曹丕的論文觀點，並舉隅反三，提出更周延的文學理論。

### 一、文氣說

劉勰曾於《文心雕龍·風骨》篇，徵引曹丕《典論·論文》的「文以氣為主」的觀點，藉以說明作家內在個性氣稟，與作品的關係，文云：

昔潘勗錫魏，思摹經典，群才韜筆，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賦仙，氣號

凌雲，蔚為辭宗，乃其風力適也。能鑒斯要，可以定文；茲術或違，

無務繁采。故魏文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

劉勰認為好的作品，應具備「骨髓峻」、「風力適」的條件，也就是能以堅實的結

<sup>19</sup> 參本人所撰〈劉勰與民間文學〉，收錄於《文心雕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三四四頁。

構和精練的文辭為骨幹，以動人的情致，形成有力的感發力量。例如潘勗的〈冊魏公加九錫文〉，取法於《尚書》，敘事簡要，文辭質樸勁健，劉勰認為是「骨髓峻」的佳作；司馬相如的〈大人賦〉，使漢武帝讀後，飄飄然有凌雲之志，足見其感人之深，被劉勰舉為「風力適」的代表；這些作品，劉勰認為都是作者個性、氣稟的外在流露，故引用「魏文稱：『文以氣為主』」，據以說明氣與「風骨」的關係。按作家的情性為作品的原動力，成功的作品，皆情性之所出，亦即氣之所貫注，乃能骨與采圓，風與辭練<sup>20</sup>，是以《南齊書·文學傳論》云：「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黃叔琳評《文心雕龍》亦云：「氣是風骨之本」，皆可證明作者的性氣為立言之本。〈風骨〉篇接著又引述曹丕「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的說法，此說見於曹丕《典論·論文》：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

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曹丕認為作家的氣稟，清濁有別，為與生俱來，無法轉移，他並以音樂為例，說明音樂的節拍曲度雖然有定，而由於彈奏者的引氣不同，技藝有別，便有不同的樂曲表現。基本上，劉勰完全認同曹丕的文氣先天，影響作品表現的說法，故〈總術〉篇亦云：「魏文比篇章於音樂，蓋有徵矣」，對曹丕首度由生理之氣反省到文學作品的個性、藝術性深表肯定。

除此以外，劉勰還引用曹丕對建安七子的評述，以建安文人重氣為例，說明建安作家的氣質與其作品的風格表裡一致，〈風骨〉篇云：

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

則云「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

可勝」，並重氣之旨也。

曹丕對建安七子的評論，散見於《典論·論文》、〈又與吳質書〉，認為孔融不論情性或作品，都能「體氣高妙」；徐幹為人恬淡從容，故其文舒緩；劉楨才情高

<sup>20</sup> 參徐復觀〈中國文學中的氣的問題〉，收錄於《中國文學論集》，三三三頁，台灣學生書局印行。

妙，爲文亦有逸放之氣<sup>21</sup>，在此劉勰不但全數引用曹丕的成說，借以說明作家的個性，體現於作品之中，呈現出不同的特色；甚至在〈才略〉、〈章表〉篇也多據曹丕之見做爲評論建安諸子的張本。

劉勰的風骨論，發揮曹丕的文氣說，並以建安文士爲例，說明作家情性與作品風格，乃因內符外的關係，且認同氣乃與生俱來，不可外移的說法，此皆與曹丕的論文觀點互爲呼應；惟劉勰又另有開展發明，例如表明氣爲風骨之本，建立其風骨的論旨，即言前人所未言；而〈體性〉篇云：

然才有庸雋，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

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雋，莫能翻其才；風趣

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

各師成心，其異如面。

劉勰以曹丕的文氣說爲基礎，擴充爲才、氣、學、習四項，才氣爲「情性所鑠」，指先天稟賦；學習爲「陶染所凝」，乃後天努力，爲影響作品風格的成因。劉勰以「氣有剛柔」，取代曹丕的「氣有清濁」，更能顯示人的氣稟不同，而無高下優劣之分，較接近氣的本質；所延伸出來的情性說，也較曹丕的「文以氣爲主」周延，更能顯現文章寫作的根源，與作家的創作個性；至於揭櫫才氣學習與作品風格的關係，更是突顯後天的可爲性，寫作不再只是天才創造說，只要「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在其中矣，這對有心創作的人而言，真是莫大的鼓舞！至於〈神思篇〉「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情采〉篇「文質附乎性情」，〈聲律〉篇「聲含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章句〉篇「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無論是探討寫作的想像力、文辭的本質、及音律的用韻節奏等方面，皆可見劉勰對文氣論的擴充與延伸。

## 二、文士行為與文學批評的關係

文學活動既然與作者的情志個性息息相關，從事文學批評，自然也不能忽略

<sup>21</sup> 《文心雕龍·才略》篇說孔融「氣盛於爲筆」，〈章表〉篇說「文學之〈薦彌衡〉，氣揚采飛」，劉楨論孔融，亦稱其「卓卓」，說其「信含異氣」，皆指孔融體氣高妙。曹丕評徐幹時有齊氣，李善注曰：「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文心雕龍·才略》篇說「劉楨情高以會采」，《詩品》亦評劉楨「仗氣愛絕，動多振絕」，大致可見其逸放之氣。

文士的鑒賞態度，與德行的具備。劉勰於〈知音〉、〈程器〉篇論及相關問題時，均曾祖述曹丕的文學觀點。〈知音〉篇云：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時之賤哉！至於班固傳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敬禮請潤色，歎以為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至如君卿脣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諮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故鑒照洞明，而貴古賤今者，二主是也；才實鴻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學不逮文，而信偽迷真者，樓護是也。

劉勰所以綜古貫今，舉例再三，旨在說明「知實難逢」。知音所以難逢，其因在於鑒賞批評者的態度有偏差：或貴古賤今，向聲背實，如秦始皇、漢武帝之對待韓非、司馬相如；或文人相輕，崇己抑人，如班固嗤笑傅毅、曹植贊美丁廙、譏評田巴；或信偽迷真，學淺妄論，如樓護之賣弄脣舌。其中引述曹丕「文人相輕」的說法，見於《典論·論文》：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

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

曹丕以班固譏誚傅毅為例，證明「文人相輕」，自古皆然！其說顯然被劉勰採信，藉以說明「知實難逢」的原因；而曹丕反對「貴遠賤近，向聲背實」，「闇於自見，謂己為賢」的批評態度，亦暗與劉勰桴鼓相應，對劉勰〈知音〉的成篇不乏啟發作用。只是劉勰更能旁徵博引，建立其系統完備的文學鑒賞理論。〈程器〉篇又云：

近代辭人，務華棄實，故魏文以為：「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

一方面劉勰採用曹丕「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的說法，認為如「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修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等，皆品德有瑕疵之士；一方面又舉「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笑，徐幹之沈默」為例，說明文人中也不乏操守貞正之士，按曹丕〈與吳質書〉云：

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

曹丕稱讚「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即〈程器〉篇「徐幹之沈默」之所本，可見劉勰對文士的德行，不論正面與負面的批評，皆曾援述曹丕的舊說。

### 三、文章的地位與功用

〈程器〉篇中，劉勰不只是對文士的行誼做消極的批評，尚有積極的建議：

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弭中，散采以彪外，  
榘桷其質，豫章其幹；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

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劉勰對文士的期許，是能獨善其身，也能兼善天下；能垂文於金石，也能效命軍國，建功立業，亦即所謂「貴器用而兼文采」，乃對內具備才具器量，對外能經世致用，而且寫作詩文，富有文采的梓材之士。《文心雕龍·序志》篇又云：「君子處世，樹德建言」，可見劉勰亦以文行兼善，做為自己立身處世的目標。劉勰這番體認，實乃曹丕《典論·論文》：「蓋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思想的延續，兩人不僅對「文章」的義涵，用指詩歌辭賦等純文學，與應用文、政論文的一般文章，甚至包括史傳、諸子的範疇是相同的；而且他們都胸懷鴻願，以「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為職志<sup>22</sup>；尤其具有時代意義的是，以文章與事功並肩，則突顯他們對文章地位與作用的重視，魯迅曾說「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sup>23</sup>，文學要有益於世用，且注重文學作品本身形式、藝術的價值，可說是曹丕、劉勰的共同體認。

#### 四、魏典密而不周

《文心雕龍·序志》篇裡，劉勰曾對前代文論的得失，有所評述：

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  
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宏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  
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舉篇章之  
意。魏典密而不周，……。

所謂「魏典密而不周」，意指《典論·論文》與前代文論「各照隅隙，鮮觀衢路」，雖論理細密而不周備。事實上，劉勰受到曹丕《典論·論文》的啟發，在分篇設體時，將兩體相近者合論<sup>24</sup>；論述文氣論、文士批評的態度、及文學的價值等方面，也多採摭曹丕《典論·論文》的觀點，所謂「《典論》辯要」<sup>25</sup>，即代表劉

<sup>22</sup> 見於《文心雕龍·程器》篇。

<sup>23</sup> 引用自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收錄於《魯迅全集·而已集》，頁五〇一。

<sup>24</sup> 見於王師更生著《文心雕龍新論》，頁二十五。

<sup>25</sup> 見於《文心雕龍·才略》篇。

總對《典論·論文》的認同與肯定；但同時，他也看到《典論·論文》零星片斷，不夠深入周密的缺點，是以劉勰吐納故新，恢宏格局，文體論方面，將文體類聚群分，多達一百八十類，探討文體的起源、性質、代表作家與作品、及文體的作法；文術論方面，以文氣論的基礎，推衍出與神思、風骨、情采、體性、聲律、章句的依存關係，更開拓了才氣學習的思考領域，使影響文章風格的內在因素更為周延，而以情性做為文學的根源，緣情觀更蔚為六朝文論的主流；文評論方面，則從曹丕文人相輕、不護細行的片斷的觀點出發，系統地開展出三項鑒賞批評的避忌：「貴古賤今」、「崇己抑人」、「信偽迷真」，及「器用」、「文采」兼顧的理論，是知劉勰評論魏典「密而不周」者，非隨口雌黃，而實乃探本之論。

### 肆、對曹丕的評價

劉勰批評歷代作家，特重他們的才性學識，評賈誼「才穎，陵軼飛兔」如此，論曹丕亦然。〈才略〉篇云：

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雋，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憎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為篤論也。

形容魏文的才性與作品的關係為「洋洋清綺」，「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劉勰認為曹丕其人才思美善，文采清麗，參覈〈樂府〉篇亦有「魏之三祖，氣爽才麗」之說，足見魏武以氣質爽朗取勝，而魏文則以才情清麗見長<sup>26</sup>。由《詩品》對丕詩的評語：「所計百餘篇，率皆鄙質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瞻可翫，始見其工矣」，《漢魏六朝賦家論略》論丕賦之特色：「子桓洋洋清綺，下筆成章，賦篇三十，或短或長，咸美瞻可玩」，及曹丕的書信如〈與吳質書〉云：「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眾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以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又與吳質書〉云：「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所流露的淡雅清麗的語言，顯示「(曹丕)」

<sup>26</sup> 試比較曹操的〈觀滄海〉與曹丕的〈十五〉詩，同為寫景之作，而操詩雄渾，丕詩精細，即可得知。

的筆調是清新而俊逸的，他的感情是深遠而雅淡的」<sup>27</sup>，故劉勰評曹丕為「洋洋清綺」，確能表現他清淡中不失雅麗的特質。才性特質不同，文思自有遲速之別。與曹植「思捷而才雋」相較，曹丕顯得「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劉勰此說，應與曹氏兄弟作〈登臺賦〉時的表現有關，據《魏志·陳思王植傳》云：

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

太祖甚異之。

曹植不但才思敏捷，揮筆即就，他所寫的〈登臺賦〉也較曹丕純粹寫景來得內涵豐富，氣象恢宏，文采亦較華美斑斕；依劉勰的說法，此因兩人才力不同，曹丕的詩因思慮精詳，構思較緩，需細加玩味，而無法一鳴驚人。以〈善哉行〉為例：

上山采薇，薄暮苦飢。谿谷多風，霜露沾衣。野雉群雊，猿猴相追。

還望故鄉，鬱何壘壘。高山有涯，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

人生如寄，多憂何為？今我不樂，歲月如馳。湯湯川流，中有行舟。

隨波轉薄，有似客遊。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

描寫客行之感，耳觸目接，無非感傷，故謂「憂來無方」，而始見其憂之深；尤其句末「載馳載驅，聊以忘憂」，更可體會旅人賴驅馳以排遣難以忘懷之憂。王夫之《船山古詩評選》卷一評云：

此篇微風遠韻，映帶人心於哀樂，非子桓其孰得哉？

寓意於言外，需賴細加沈吟玩賞，才能體會個中滋味，此即〈才略〉篇所謂「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頗能得丕詩旨趣。

劉勰次論曹丕創作的特長，以「樂府清越，《典論》辯要」為曹丕作品的雙璧。按曹丕的樂府詩所以「清越」、《典論》所以「辯要」，仍與其之才性特質有關。由於慮詳、力緩，使他抒情能深婉有韻致，論理則能精密思考，兩者互為表

<sup>27</sup> 見於林文月著〈曹氏兄弟的詩〉，收錄於《中國文學評論》第一冊，頁一五二。

裡。而〈才略〉篇謂子建「詩麗而表逸」，子桓「樂府清越，《典論》辯要」，以「迭用短長，亦無憎焉」來看待曹丕、曹植不同的文學成就，顯示劉勰能考慮到作家各有所長，互有所短，而不妄語高下優劣，無疑是很客觀的評論。

結尾，劉勰以作家的際遇不同：「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為曹丕在一般的評價中低於曹植而抱不平，所謂「俗情抑揚，雷同一響」，「未為篤論也」，顯示劉勰對舊談揚陳王而抑文帝之看法，並不滿意。舊談中最具代表性的為鍾嶸《詩品》，其評魏陳思王植詩：「其源出於國風，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古今，卓爾不群。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又評魏文帝詩：「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所計百許篇，率皆鄙質如偶語；惟有『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贍可翫，始見其工矣。」以言語質樸列曹丕為中品，曹植文質彬彬被選為上品。惟劉勰認為俗情乃基於同情政治弱者的緣故，致使曹丕評價不及曹植。其實，就創作環境而言，曹丕稱帝後，治國用兵事繁，使其文學性作品減少，宣達政令的詔策增多，具有代表性的詩賦文章，多完成於建安時期，則九五至尊對曹丕的文學創作及成就確有影響；就《文心雕龍》全書而觀，儘管曹氏兄弟的文學表現各有短長，但相較於對曹丕的評價，劉勰論曹植之詩云：「兼善則子建、仲宣」，論聲律云：「陳思潘岳，吹籥之調也」，論才性云：「陳思，群才之英也」，論文章云：「陳思之文，群才之俊也」，顯然劉勰對曹植的評語還是略高一籌，基本上與「俗情抑揚」，並無二致。雖然如此，劉勰此番為曹丕辯難的文字，已激起迴響，至明清仍嗣音不絕，認為子桓不及子建的，如明人徐禎卿《談藝錄》云：「曹丕資近美媛，遠不逮植」，清人丁晏《曹集銓評》云：「子建忠君愛國，立德立言，即文才風骨，亦迥非子桓所及。舊說謂去植千里，真篤論也。彥和以丕植並稱，此文士識見之陋」；為曹丕抱屈的，如明人王世貞《藝苑卮言》：「吾覽鍾記室《詩品》，…至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屈第乎下，尤為不公，少損連城之價。」清人王夫之《薑齋詩話》亦云：「曹子建鋪排整飾，立階級以賺人升堂，用此致諸趨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紙揮毫，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韻，以絕人攀躋，故人不樂從，反為所掩。子建以是壓倒阿兄，奪其名譽。實則子桓天才駿發，豈子建所能壓倒耶？」曹氏兄弟文學成就的評比，已然成為文學上的重要論題。

## 伍、結論

綜合而論，《文心雕龍》對曹丕的評述，具有以下三點特色：

### 一、寄言褒貶，言出有據

劉勰評論曹丕的作品，概括曹丕在各文體型態上的表現，如詩歌、辭賦、詔令、銘文、笑書、謎語、文學批評等，涵蓋甚廣，大抵可信；而論曹丕樂府清越，

「秋風」列篇，音節靡平；稱詔令辭義多偉，而「作威作福」之語，則不免智者一失；觀「九寶」銘文，言辭鈍拙不及寶器之銳利；評所寫謎語，精鍊周密，卻有違諷諫匡正的作用；謂《典論·論文》「文人相輕」，以文氣譬諸音樂之語，皆言而有徵，既贊其「辯要」，又惜其「密而不周」，未能建構理論系統。可見劉勰對於曹丕的評論，褒貶互見，或依據事實，判別優劣，或根據文體寫作體則，抑揚臧否，皆能言出有據，平理若衡。尤可貴者，劉勰評論曹丕，能考慮其才性差異、創作特長、人生際遇之不同，作全面性的評騭，既不妄語高低，也不受對象政治地位的影響，不被俗情定見所囿，評曹丕「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憎焉」，「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為篤論也」，即是證明。在劉勰筆下，對於曹丕文學創作的重視似乎不及其文學理論的建樹，此意味曹丕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與重心所在，也確和一般對曹丕的評價相同；而將魏文〈燕歌行〉視同韶夏之鄭曲，對於遊戲之作的謎語，責其「用乖遠大」，均可見劉勰重視文學的社會教育的功能，甚至有矯枉過正的現象。

## 二、全盤宏觀，而忽略個別差異

劉勰評論作家，其特長在以宏觀的器識，為一時代的文學把脈，而能切中代表人物與時會、文風的關係，其論曹丕，即頗能掌握魏文以政治地位的優勢、愛好文學的志趣，對建安文學，尤其是辭賦蓬勃發展的關鍵地位；改設秘書令為中書，以才地俱美者掌贊詔命，亦使詔文獨盛一時。而劉勰論建安之初，五言騰躍，並舉述曹丕等作家，更是權衡至當。惟於〈時序〉篇緊扣「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代表建安詩文的內容，以「雅好慷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形容建安文人的志意、文學的風格，又於〈明詩〉篇再次重申建安「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的詩歌內涵，「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的人文特質，及「不求纖密之巧」、「唯取昭晰之能」的語言特色，基本上皆與〈時序〉篇互為呼應，代表劉勰對建安文學一貫的主體印象；但此一對時代文學通盤的品評，畢竟是以部分代表全體，無法涵蓋建安文學的全面；對曹丕而言，更無法突顯他詩文的主要內涵與特質。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云：「其源出於《十九首》，淡逸處彌佳。樂府雄壯之調，非其本長」，沈德潛《古詩源》亦云：「子桓詩有文士氣，一變乃父悲壯之習矣，要其便娟婉約，能移人情」，都精要地指出丕詩具有文人氣質，多取材自閭里小事，擅寫游子思婦的情感，情思婉轉悠遠，語言質樸明白。劉勰所標舉的遊宴之作，悲壯勁健的風格，顯然無法代表曹丕。尤其曹丕在建安文學中扮演的轉化的角色，如其七言詩〈燕歌行〉在詩體形式的演進上，有開創性的貢獻；詩文有「詩賦欲麗」的傾向，為六朝文學由質轉文的轉捩點；及曹丕好尚老莊思想，使個人情性的表現，文學本身的價值愈受重視，進而形成六朝的文學風潮等，劉勰皆隻字未提，未予

重視。

### 三、繼承而能創新

劉勰重視文學的推陳出新，有〈通變〉一篇，言「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專論文學作品的法古變今之理。驗之於他對曹丕文學觀點的因襲與開創，足徵劉勰已實證其「通變」理論。曹丕的文氣說，不僅在《文心雕龍》〈神思〉、〈體性〉、〈風骨〉、〈情采〉、〈聲律〉、〈章句〉等篇，有更豐富、深入的開展與應用，而曹丕對文士行爲的批評，如「文人相輕」、「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亦爲劉勰所本，建立其文學鑒賞理論的系統，與文士「貴器用而兼文采」的標準；劉勰「君子樹德建言」，「摛文必在緯經國」的思想，也在曹丕「文章爲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基礎上，有進一步的發揮。文學理論上，謂劉勰爲曹丕之知音，曹丕爲劉勰開先的導師，誠不爲過。

## 參考文獻

- 文心雕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師大國文學系。
- 方元珍著，〈文心雕龍論王粲〉，台北：《空大人文學報》第九期（八十九年）。
- 方元珍著，〈劉勰與民間文學〉，《文心雕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師大國文系印行（八十八年）。
- 王弘先撰，曹丕及其詩文研究，台北：文化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
- 王利器校箋，文心雕龍新書，台北：宏業書局。
- 王忠林著，文心雕龍析論，台北：三民書局。
- 王師更生注譯，文心雕龍讀本，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 王師更生著，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秘寶－文心雕龍，台北：黎明文化公司。
- 王師更生著，文心雕龍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 王師更生著，文心雕龍新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 王運熙著，文心雕龍探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王瑤著，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王巍著，〈曹丕詩歌藝術淺論〉，《吉林大學學報》1994年5月。
- 王巍著，建安文學概論，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
- 朴貞玉撰，三曹詩賦考，台北：國立師大碩士論文。
- 余冠英等賞析撰寫，古詩新賞－曹丕，台北：地球出版社。
- 余冠英選注，三曹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呂武志著，魏晉文論與文心雕龍，台北：樂學書局。
- 李曰剛著，文心雕龍斟詮，台北：國立編譯館。
- 李直方著，魏晉六朝詩論稿，台北：龍門書店。
- 周振甫著，文心雕龍今譯，北京：中華書局。
- 林文月著，中國文學講話：魏晉南北朝文學－曹丕，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林文月著，曹氏兄弟的詩（中國文學評論第一冊），台北：聯經圖書公司
- 俞紹初輯校，建安七子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 柯慶明、曾永義主編，兩漢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資料彙編，台北：成文出版社。
- 洪順隆著，魏文帝曹丕年譜暨作品繫年，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夏傳才、唐紹忠校注，曹丕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
- 孫明君著，三曹與中國詩史，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
- 徐公持著，中國歷代著名文學家評傳－曹丕，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
- 徐復觀著，中國文學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 張少康著，〈論文學的獨立和自覺非自魏晉始〉，《北京大學學報》1996年第二期。
- 張溥題辭、殷孟倫注，漢魏文朝百三家集題辭注，台北：木鐸出版社。

- 曹操曹丕曹植資料彙編，台北：木鐸出版社。
- 曹操撰，曹操集，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
- 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台北：里仁書局。
- 陳飛之著，三曹詩論集，廣西：廣西師大出版社。
- 陸侃如、牟世金著，文心雕龍譯注，山東：齊魯書社。
- 陶建國著，兩漢魏晉之道家思想，台北：文津出版社。
- 黃侃著，文心雕龍札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 黃師錦鉉著，〈曹丕典論論文對魏晉文風的影響〉，《書目季刊》第十七卷第三期。
- 黃節註，魏文帝明帝詩註，台北：藝文印書館。
- 楊明照校注拾遺，文心雕龍校注拾遺，台北：世界書局。
- 葉嘉瑩著，漢魏文朝詩講錄，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裴松之注，新校本三國志注，台北：鼎文書局。
- 趙幼文校注，曹植注校注，台北：明文書局。
- 趙福壇選注，曹魏父子詩選，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劉永濟編著，文心雕龍校釋，台北：正中書局。
- 劉師培編，中古文學史，台北：文海出版社。
- 劉澐著，魏晉南北朝文論佚書鉤沈，自印本。
- 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台北：華正書局。
- 劉勰著、范文瀾註，文心雕龍註，台北：學海出版社。
- 蔡英俊撰，六朝風格論之理論與實踐探究，台北：台大中研所碩士論文。
- 鄭孟彤著，建安風流人物，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
- 魯迅著，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魯迅全集·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穆克宏著，文心雕龍研究，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
- 蕭滌非著，漢魏文朝樂府文學史，台北：長安出版社。
- 鍾京鐸著，曹魏父子詩研究，台北：學海出版社。
- 鍾嶸著、汪中注，詩品注，台北：正中書局。
- 顏之推著、高安澤注譯，顏氏家訓新譯，台北：育寶出版社。
- 羅根澤著，中國文學批評史（魏晉六朝），台北：學海出版社。
- 羅根澤著，樂府文學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 The View of Wen-Shin-Diao-Long on Tsao Pi

*Yuan-Jen Fang\**

### Abstract

Tsao Pi was not only a wise emperor of the Wai Dynasty but also an elite of Chien-An literary circle. He has profound influence on and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poetry, prose, genres technique and thriving literary theories. All the above are the general assessment of Tsao from Liu Hsieh, a credible critic who objectively analyzed a wide range of genre. He adopted and agreed with Tsao's literature viewpoints such as his style and attitude for literacy critic as well as 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his work. Moreover, Liu also used these as the foundation to create his theories on genres, literacy and critic. Liu's evaluation on Tsao's work was very impartial and free of political and emotional factors. With Liu's vision and Tsao's passion for literature, Liu promoted the value of Chien-An literary trend of poetry and proclamation. However, Liu, limited by the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 and emphasized on the teaching function of literature, neglected the contribution of *Yan-Ge-Xing* to poetry and treated it as decadent music. He also criticized the unusual and dynamic allegory which was overcorrected. He took some qualities of Chien-An literary as a whole. Resulting the negligence of the comprehensive view of Chien-An literary of "contemporary articles are prefer to fervent" and "articles with deep thinking and elegant rhetoric become fervent and plentiful" repressed the main purposes and characters of Tsao's work.

**keywords :** Wen-Shin-Diao-Long, Liu Hsieh, Tsao Pi, the Literary of Chien-An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